

一、无处不在的地图

日本人对地图的重视，中国人已经有所了解。看看有关日本人侵略中国的书，那上面充满了日本间谍深入中国乡村了解中国地理的故事。笔者看到过的一篇文章上说，日本人在侵略中国前，甚至把某些地区水井的位置标在地图上了。改革开放后，许多日本企业重返中国，居然还能受益于当年搜集的地理情报。日本一家企业在山东投资，其决策前提就是侵华时对山东风土、人情以及资源的调查资料。在日本，笔者看到不少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人写的书，这些书往往在关键之处，必有地图一份出现。日本人的历史记忆是与地图联系在一起的。

日本的地图也有出笑话的时候。笔者接待过一个日本学者，谈完学术上的事情后，要请我到北京安定门附近的一家叫“白云”的日本料理吃饭。谁知按图索骥，开车找了很长时间，踪影全无。下车一问，才知道“白云”的位置与地图上标出的正好相反。那位日本学者埋怨地图质量太差，原来地图是日本出版的。有些读者可能把这作为笑谈，我却对日本人的地图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地图对日本人来说，不仅是整个国家走向世界的工具；也不仅

是日本企业走向世界的工具；更是“庶民”走向世界的工具。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如何，对外开放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从地图上可以有所了解。

我所在的亚洲经济研究所，至今还保存着当年日本人搜集的中国地图以及亚洲、非洲等国的地图。中国的地图，不论哪个时代的，哪个局部地区的，一律保存。甚至日军侵华时测绘的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也仍然保持完好。久而久之，仅凭这些地图，日本人也可以研究中国某些地区的变化了。亚洲经济研究所拥有的世界各国地图达 6 万张！亚洲经济研究所还收购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的旧地图。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看书，看到有一位老者拿着一张旧中国东北地区的地图，给图书馆职员看，最终以 2 万日元成交。

日本人认为，作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研究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可靠、详实的地图，是起码条件。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办公室墙上，一般都贴有研究对象国的地图。不同研究部门的小型会议室也有相应地区的地图。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到国外出差，首先要在地图上找到出差国的位置，弄清出差国所到城市的交通状况。丰富的文字资料加上地图，使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成为“立体”的，成为“三维空间”内的研究。相比之下，我国哪一个研究日本的机构坚持不懈地去搜集日本的地图了呢？

这次到日本，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日本人不仅把地图作为开拓自己生存空间的工具，而且也将其作

为治理国家，推进国家全球战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工具。

在日本懂得运用地图，是企业经营的起码常识。一个企业，要在各种媒体上做广告，首先要标明自己的位置。不论大小企业均如此。除了标明自己的位置之外，还要向客户或潜在的客户提供可供选择的交通路线。有许多小餐馆、旅店更是别出心裁地在火柴盒上注明了自己的位置。笔者是火花的搜集者，这些五花八门的火柴盒自然成了绝好的搜集品。闲来无事取出来看看，回想起前尘往事，自然也想起了那个企业。

在日本许多机关、企业都备有标示自己位置的地图卡，放在一进门的地方。来访者可以随便拿。笔者在 1996 年访日时在东京霞关大藏省印刷局的政府发行物书店拿了一张该店地图，2000 年笔者再度访日时，按图索骥，顺利地找到了这家书店。

在日本常常会遇到在道路旁、车站前、商店里分发广告的人。这些人往往除分发广告外，还附带送上一包纸巾，回家一看，纸巾上印着地图，地图上醒目地标出了该企业的位置。这些地图不仅意味着印制者希望客户的到来，而且意味着印制者希望你来了一次后，还记得它们，会常常来。

日本大公司的调查部（即企业搜集情报的机构）要调查外国某地的投资环境，首先要了解的是那个国家的详细地理情况，包括该国的政治、法律、气象、水资源、矿产资源、交通、人口、城市、环境保护状况、能源供应、企业分布等等。这

些资料搜集齐全并予以认真分析后，才进入投资的经济可行性分析。我看到过一份这类的材料，厚厚一本，有 30 余万字之多。

不仅仅是企业重视地图，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甚至幼儿园都重视地图。在大街上、公共汽车和地铁车站，常常能看到标示着它们所在位置的地图。

为普通国民服务的地图到处都是，而且种类繁多。

一个对日本复杂的轨道交通系统（包括地铁、轻轨、高速铁路）不了解的外国人，只要耐心看车站上的各种地图，肯定能找到回家的路。公共汽车的路线也用地图明确地予以显示。在成田机场，旅客可以根据一幅又一幅地图指示牌找到地铁。

在旅行社，到处是供旅行者随意取用的地图。旅游地图在车站、饭店、旅馆随处可见。书店则把旅游地图、驾驶员用的地图用专柜陈列，放在显眼位置。在饭店大堂的柜台上都放有标明饭店位置的地图或卡片。语言不通的游客，出门时拿一幅地图就可以放心地旅游了。开国际会议，地图更是必不可少。主人往往在客人刚到旅馆时，就在会议文件口袋中附带地装了一大堆地图。笔者 2000 年 7 月到日本开一个国际会议，在文件袋中大大小小的地图共有 7 张，有东京地图，品川（东京的一个区）地图，东京地铁交通图，到庆应大学（会议召开地）去的地图，旅游地图，主办单位所在地地图，还有所在饭店的地图。

日本人还别出心裁地把古代日本的交通图大量印刷。一来满足了许多人学习历史的要求；二来可以使有兴趣的人按照古代道路徒步旅游。例如，日本大诗人松尾芭蕉的旅行图，江户时代大名进京参觐时的地图，就被出版，供人们仿效。我的一个日本朋友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江户时代的人，每个星期天按照古代地图徒步旅游。我由此想到中国如果有人把唐僧西天取经的路线，徐霞客旅行路线，毛泽东年轻时在湖南考察路线，红军长征的路线，解放战争中第四野战军南下的路线，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路线等等印刷出来，也一定会很受欢迎吧。不过一定要大比例的，能让人真正按照具体路线走。

在日本，你要到一个朋友那里去，又不认识路，那么十有八九他会通过传真，给你发过来一幅地图。

日本的新闻媒体更是重视地图。电视台播发新闻，遇到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播音员往往会拿出一块地图板，准确形象地对事件予以解说。报纸上对重大事件的报道，也要配发地图。在地图的运用上新闻媒体更是独具匠心。2000年岁末，《产经新闻》把由泡沫经济兴起到破灭的首都圈地价，用不同颜色在地图上逐年标出，让人一目了然。

在日本租房子，出租房屋的公司首先会给你一张准确标明出租的房屋所在位置的地图（是准确地标出，而不像国内有些物业公司把离得老远的地铁标上通过自己的小区）。日本的住宅小区中，一般都立有详细标明小区建筑的地图板。有一次笔者从

北京回到日本，由于坐错了电车，下车后搞不清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正在焦虑之中，突然发现路旁立着一块标明该小区位置的地图。在仔细研究了这块地图板后，我终于找到了大致方向。走了一段路后，又适时地出现了另一块地图，上面标明了我住的小区的位置，于是安全地回到家中。

日本的地图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几乎都标有“当前位置”。这样看地图的人可以很方便地根据自己所在位置，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

日本政府把全国各个地区都制成了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供国民使用。仅东京就有好几种详尽的地图，包括首都圈的地图，东京地区交通图，东京地铁图等等。由于东京是日本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又是国际大都市，因此东京的地图格外详尽，首都圈（包括东京以及周围的几个县）的地图是三万分之一的。东京市 23 个区的地图则是二万分之一的。

日本人喜欢利用地图，到了泛滥的程度，书本、文件上到处是地图。由于喜欢用地图来表示事物，以致有一种“泛图化”的趋势，即便不是地图的事物，也要由图表来表示。例如，政治人物之间的人脉关系，企业间的兼并重组，政府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世界货币体系与各国货币体系的关系，都少不了用图来表示。这样虽然有时显得图过多了，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但是，对我这个日文只有日本中学生水平的外国人来说，有了图就直观多了，连猜带蒙，多了解了不少东西。

近年来，信息化、数字化在日本的地图应用方面也有体现。在饭店、车站有了供游客查找的电子地图。相当多的小轿车上，装备了电子导航系统。行进中，电子导航系统随时向车主报告汽车所在位置，并提醒车主周围都有哪些建筑物和单位。在网络上寻找商店、学校、研究所或政府机构，同时也可以看到所要寻找的单位地图。

小小的地图使整个国家的运行大大提高了效率，使国民的生活更加方便，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地图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国家的管理水平，标志着国家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程度。用现在时髦的话说，通过地图，国民及时地得到了直观而准确的大量行动信息，提高了在信息化时代的行动能力。

地图比文字易于理解，更具有国际性。目前北京正在申办奥运，我想不妨在地图的设置与运用方面多下些功夫。

对于初到日本而又语言不通的外国人来说，学会利用地图则是生存下来并进行活动的基本条件。在日本，我随身带着 3 本书，一本是东京都市圈的地图；一本是《外国人在日本生活 ABC》；还有一本是《简明英语会话》。靠了地图，再加上让日本人费解、自己也不大明白的“赵式”日语（日语加中国语加英语），我大胆地在日本闯荡，所向披靡。向日本人问路时，我一边指点着地图，一边说着自己也不明白的“赵式”日语，居然总是解决了问题。

二、纵向社会？ 横向社会？

不少社会学家把日本称为“纵向社会”，包括一些颇有名气的日本学者。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在其所著《日本社会》一书中提出，日本社会是按照“纵式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所谓“纵向社会”简而言之就是整个社会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权威，一层层地组织起来的，国民之间、基层组织之间缺乏相互的联系。但是此次长住日本，却让我觉得日本更像是一个“横向社会”。

日本学者研究什么问题都要成立一个“会”，通过“会”把各行各业中对同一个问题有研究的人组织起来，共同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讨论。有时还共同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即使是政府委托的课题，也可以组成“会”来进行研究。“会”由研究课题的发起单位负责具体组织，有时发起单位还要出一些钱，以便活动。但是在“会”的内部，讨论问题时是平等的。有时邀请来的专家往往由于具有学术上的权威，而居于实际的主导地位。如果你参加了一次这样的“会”，并且学术表现令人满意，你就会被人记住，并长期保持关系。在日本，某一研究领域的学者往往形成一个“非组织”的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谁对谁的研究领域、特

长，均有所了解。所以一旦有课题，可以随时把人组织起来。某些著名的日本学者还组织有按照自己的小圈子组成的学习会，经常就一些重要学术和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形式上比较随便，但有些影响日本经济、政治进程的重大政策，就是这种讨论中逐步形成的。在日本，如果一个学术单位要召开一个国际讨论会，或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来日作报告，往往会前在有关学术单位广泛发放通知，征求参加者。在学术报告会免费发放的材料中还有一个征求意见卡，参加者如果有意见，可以写在卡上。有学者认为，这种学术交流的社会网络，促进了日本的技术进步。一个单位内，学者们对其他人在研究些什么，如果他想了解，也是可以及时知道的。国际学术界实际上也大致如此。政府机构也经常针对某一项重大技术进展，举行有技术人员、企业家、官员参加的报告会，交流信息，推广技术。

不仅是学术界，各种各样的“会”在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均起着很大作用。日本人往往妻子的生日聚会可以不到场，但是同学会却必须参加。如果你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或其他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同学会更是非参加不可的。日本人讲究“人脉”，具有什么样的“人脉”，往往决定了一个人在哪一层次上沉浮。而“人脉”就是由形形色色的“会”组成的。日本官厅为了协调意见，也往往组成由政府官员、学术界、企业界共同参加的审议会、恳谈会。

自民党的政治家根据政治观点、自身利益、资

金来源分成不同的派系，派系的组织形式就是“会”。有“宏池会”、“青岚会”、“经世会”、“创造自民党的明天会”以及“参拜靖国神社会”等等。派阀是自民党政治家的基础。每一个成气候的政治家身后必须有“会”的支持。例如，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在财界、政界的支持者就组成了“芳春会”、“吉兆会”，“大平会”、“未广会”、“大荣会”等十几个“会”。^①日本另一个前首相田中角荣，背后也有家乡支持者组成的“越山会”。日本政党从来是“党内有派”的。不过近年来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种种行径已经厌烦了，因而有些自民党政治家也打出了在党内“无所属”的招牌。有些政治家则真正“无所属”，不参加任何党派。在近几年的县知事选举中，往往是无党派的候选人获胜。尽管“无所属”，但是在议会“无所属”议员也组成了“无所属会”。

政治家、政府官僚、学者、企业家还经常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组成各种“学习会”、“研究会”、“恳谈会”。在这些“会”上讨论形成的某些共识，在适当的时机会成为政府的政策。这些“会”也成为政治家搜集、整合自己人力资源的场合。小泉内阁负责经济政策的大臣竹中平藏（原来是大学教授），就是在这类接触中成为小泉的经济改革智囊的。没有派阀的政治家，在日本人看来是没有“腕力”的。前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的威望一

（日 日本现代评论社编：《昭和宰相列传》）。

度如日中天，甚至有《田中总理大臣》一书问世，可是当了外相没几天就黯然引退。除了是女性、缺乏从政经验等原因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她在自民党内不是重要派阀的首领，未能构筑自己的权力基础。

与军事有关的“会”有旧日本海军军人会，“遗族会”，全国防卫联合会等等。这些“会”有时还承担一些官方委托的重要课题，对日本的安全战略发表看法。例如，全国防卫联合会由退役的自卫队军官、政府官员和有关企业负责人组成，对日本的防卫政策经常有所建议。这些会往往成为日本民族主义者集会、议政之所。有些“会”还成为政治家不能不予以重视的政治力量和“票源”。以“遗族会”来说，现在其成员大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死者的亲属。这些人已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集团（日本政府对战争中死去的人的遗族发放抚恤金），因此他们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罪行，抱有极为错误的观点。尽管如此，因为这个会人员多，影响力大，财力大，所以自民党的政治家即使政治立场比较中立，对战争责任有比较清醒认识的人，在权衡内政与外交的得失后，往往也不得不为了选票，投其所好地去参拜靖国神社。

在街道、农村也有居民、村民的自治会。在城市里，商业集中的地带，一般都有商会。连农民种菜、养殖、销售产品也成立“会”，以便一起研究有关的种菜、养殖技术，共同推销产品。日本一般市民也经常出于各种爱好，组织学习、研究小组或

者研究会，共同切磋。日本人在退休后，比较容易找到适合于自己兴趣的“会”，参加进去。我认识的一位日本朋友就与其他几位对中国文学有兴趣的老人组成了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学习组。有些“会”就是由某些企业、机构的退休人员，按照原来的“人脉”组织起来的。其活动也多与过去的经历有关。

日本企业界的“会”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会”有的按照产业领域进行组织，如“自动车工业会”（即汽车工业协会）；有的按照地区进行组织，如各地区的“商工会议所”。企业界各种会的会长一般由大企业的头面人物担任。实际负责具体事务工作的往往是挂有常务理事或“专务”头衔的政府“下凡”^①官员。最赫赫有名的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有日本经济内阁之称。日本政府决定重大经济战略、政策必然要咨询“经团联”的意见。日本政府各经济主管部门在决定政策时，往往要咨询有关产业审议会的意见，产业审议会就是一个包括民间企业、学术界、新闻界、政府官员在内的横向组织。

尽管日本是一个市场竞争激烈的国家，但是在

日本政府各机构都有自己长期经营的“领地”，由于日本政府与企业间的微妙关系，政府官员到了退休时或由于年龄大升迁无望时，就可能被派到这些“领地”去担任领导工作。这些“领地”，可能是企业，也可能是研究机构、协会。政府官员在这些“领地”中可以获得比在政府机构更加优厚的待遇，可以工作到较大年纪。政府官员这种外派被日本民间称为“下凡”。

企业间通过行业性组织，却可以充分沟通信息，进行协作。例如，战后日本与欧美国家在造船技术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通过造船协会的技术研究委员会把组装焊接法、放大划线法等新技术通报给全国的造船厂，使各个造船厂都可以吸收这些技术。没过多久，日本造船业就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据笔者观察，日本还存在着大量的无“会”之名，有“会”之实的组织。例如，笔者接触过一些在日本居于重要地位但正在渐渐消失的老人，这些老人或在大公司任职；或是学术界某方面权威；或在重要的民间团体工作；或处于半隐居状态。他们之间联系非常紧密。正因为笔者认识他们中的一位，因此得以认识其他的人，给笔者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大方便。据笔者分析揣测，他们是以共同的工作经历（日本侵华时，他们都在“满铁”^①工作过）联系在一起的。无“会”之名，有“会”之实的组织中人，一旦占有了重要岗位，就会声气相通，互相提携，推波助澜，形成一种力量，推行自己的主张。实际上，日本国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了几次军人政变，就是军队中存在这种非组织的组织所致。青年右翼军人形成的小组织，导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频繁出现所谓“下克

^①“满铁”是日本侵华时在中国东北建立的“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其总部设在大连。“满铁”既是一个企业，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协助日本政府侵华的机构。

上^①的政治形态，是日本政治越来越法西斯化的重要因素。

在日本的政府机构内部，有时也采取横向的组织形式。例如，我在日本通产省通商谈判课访问时，就在该课人员名单上看到了农林水产省、邮电省、经济企划厅的“驻在员”。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访问时，该所的某研究室室长是位女士，一问才知道她是来自经济企划厅的官员。日本政府官员经常借调到其他部门任职。据说这样能够在各部门之间，进行充分的沟通，加强制定政策时的相互理解。即使在本省内，也是横向调动。通产省的一个公务员在一个岗位上干两年左右，就要调换岗位，而且一般是调往另一个局，甚至是驻外单位。这样培养出来的自然是“通才”。但是对其专业水平，我是有疑虑的。而我国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如果不是升迁，则很难调出本局。虽然这样有利于培养出技术专家，但也往往使公务员眼光狭窄，适应能力差，甚至结党营私，只知道维护本单位的局部利益。究竟是哪种方式好，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不过我想，计划经济时代熟悉某个专业的技术型专家可能会比较适应；市场经济时代，可能政府公共管理更需要的是管理型的通才。

① 所谓“下克上”是指日本战国时代中央政府瓦解，家臣反叛大名，大名反叛中央，天下大乱的政治形态。日本历史学家用“下克上”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些好战的日本青年军人不断脱离或违反政府、军队首脑的战略、政策；不听政府、军队首脑的指挥 对内频频发动政变 对外频频滋事的行为。

日本的学术机构，往往更愿意采取横向的形式组织。一个学者可能在两个部门同时兼任研究职务。有时，一个学者由于需要，可能较长期地被派往另一个单位工作。即便是政府部门办的研究所，学者参加本单位之外的研究，也是没有障碍的。有水平、有经验的退休政府官员、企业领导或专家，只要愿意又符合条件，就可能到某一研究所或大学工作。我认识的一位日本外交官，退休后就到明治大学任教授。日本政府办的研究机构，其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要对外开放，搜集的图书、资料也要对社会开放。研究所还要经常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向社会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在活动举办前，要在报刊上广泛征集参加者，有些研究机构还对参加者一律免费赠送材料，提供工作餐。政府研究机构以此证明自己没有白花纳税人的钱。民间研究机构以此向出资者表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日本的新闻机构更是通过横向的组织形式来制作节目。无论是新闻节目、政治、法律节目还是娱乐节目，电视台都组织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学生乃至家庭主妇共同进行评论、参与。政府高官或议员对此也乐于参加，因为毕竟是提高知名度的机会。不论是谁，只要参加节目，就与其他人一样，听主持人的指挥、调度。参加者在发表意见时七嘴八舌，没有一定顺序。一个家庭主妇可以在节目中对政府官员的观点进行批驳。有趣的是，笔者在日本期间，恰逢森喜朗内阁进行改组，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就拿了一些政治家的木偶在街头询问老

百姓的意见，并请他提出自己的组阁看法，组成自己认为满意的内阁班子。由于有些人经常参加这类节目，因此成了所谓的“评论家”。在日本，“评论家”是专指在媒体的节目中发表意见的人，这些人不一定具有多高的学问或地位，因此“评论家”在节目中的意见大家常常作为谈助而已，不一定受到重视。评论家自己有时也插科打诨，取悦、迎合大众。评论家的话，大众也知道并非权威观点。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出镜发表看法的人，才是真正的专家、学者。“评论家”与专家、学者，在日本是有明确区别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既满足了受众的要求，又不致混淆视听。我国传媒中经常发表评论的则是一些由专家、学者“转业”的电视明星，这些人时间长了往往搞不清自己的角色，什么事情都讲，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例如，一个经济学家可以预测股市上涨的具体点位。这样很容易对受众产生误导。

日本不仅有着大量的横向组织，而且组织之间的信息沟通也往往是横向的。一个外国学者到了日本，很快这一领域的日本学者都会知道。你在前一个单位进行所提的问题，当你到下一个单位时，人家已经全部知道了。同样，你的履历下一个单位也会得到一份。在日本，往往一个人调动到了另一个单位，但原来的人际关系还存在，一旦有事就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做研究工作尤其如此。

2000年7月，我主编的《中国产业政策实证研究》一书出版了。小小制作，自己认为不足挂

齿。但是当年 12 月，到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第一周，就有位日本朋友拿着拙作的复印件来找我，表示他对书中某些章节很感兴趣，希望我能够帮助找到原书。我到日本后的第一个月，忙于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又加上人生地不熟，语言障碍较大，因此没有给任何接待单位以外的日本朋友打电话。但是，当我开始给日本朋友打电话时，他们显然早已知道了我的到来，并知道我在日的停留时间，学术访问的内容，而且已把与我会面排上了议事日程。

在海外的日本人之间，这种横向关系更为明显。我接触到的在北京进行研究、学习的日本学者，经常互通信息，有学术活动也互相通知。如果谁在北京进行调查研究，那么其他学者也可以参加讨论或旁听。不仅是学者，在北京的日本企业界人士、外交官、留学生，都是声气相通，守望相助的。

日本政府的有关公报、研究报告往往是对外公开的，日本的研究单位、企业如果想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得到。在日本东京霞关^①有一家专门卖政府机构公报、统计报表、年鉴以及各种报告的书店。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购买他想要的政府有关资料。日本政府机构的设置、组成、人员都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专门出版的介绍政府机构的书上找到自己想找的政府部门。这些书上对中央政府机构的每一个课，每一位官员都有介绍，并刊登着

日本政府的主要政府机构集中于东京的霞关。